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七八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五六期 ——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408d）

【亲历者言】	关于《邱会作家书》的对话	程 光 · 高伐林
【拒绝遗忘】	拒绝接受道歉恰当吗？	余不洁
【史实辨证】	卞仲耘命案争论拾遗	华新民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亲历者言】

关于《邱会作家书》的对话

• 程 光 · 高伐林 •

高：儿子眼中的父亲邱会作，是怎样一个人？如果要用简明的语言归纳，会怎么叙述？您对父亲的理解，是否有一个变化过程？

程：说起来很惭愧，我长到青少年，还不很了解父亲，只知道他是军队干部，工作非常繁重。我住校学习，周末才回家，而他总在忙，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和我们相处。我开始了解父亲，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已是大学生了。父亲面对着中央文革、全军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的冲击，本可以隐忍顺守，暂避锋芒，但他选择了制止“打砸抢”，反对在军队领导机关“造反夺权”，因此受了大难，遭到严酷的武斗，被打成重伤致残。危急时刻，我冒险到了造反派的“牛棚”，把重要消息写在手心里，传递给了关押在那儿的父亲。他咬紧牙关、撑住武斗，终从造反派手中挣脱。从写在手心里的这封特殊的“信”开始，我们父子间加深了理解和信任。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广东工作的我与家人失去了联系。1979年我才得知父亲被关在秦城监狱，在一次探监中，他把写有半张残破纸片上的信带了出来，我知道加在他头上的罪名“武、谋、逃”纯属强加。1981年他解除监禁之后，他本可以及时地为自己申诉辩白。但他没有那样。他写信对我说，“对个人问题一字不提。中心问题是要表明，我是关心

因我的问题而受株连的人，并非是在做什么文章。我也会明确提出，天大的问题由我承担责任，而不要株连无辜的人。”（《邱会作家书》21页，以下简称《家书》）。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一个敢于担当，忠于职守的人。

父亲被安置到西安，从那时开始，我和父亲见面的机会多了，经常和他谈，从开始的亲情家常，到后来成了无拘无束的深入交流。我帮助他收集资料、阅读整理他回忆稿，了解了从小参加红军，英勇战斗、勤奋工作、历经磨难的生涯，又目睹了他出狱后为了澄清历史真相，撰写回忆，走过最后二十一年艰辛的路。从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父亲的内心精神世界，对他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爱。

如果让我用简明的语言归纳一下心目中的父亲，正如他1992年在给中央的信中所言，“对自己从小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无悔无恨。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平时时期，我一贯勇敢战斗，积极工作。我对党，对国家，对我的祖先，对我自己，都问心无愧。”（《家书》248页）。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高：父亲被监禁之后，您首次见到他的印象和感受是什么？

程：那是1980年初，我在北京秦城监狱看到了分别九年的父亲。他面色灰黯，非常消瘦，眼窝都凹陷进去了，手臂从袖子里伸出来，枯瘦如柴，让我都不敢认了。三九隆冬的寒天，他没有衬衣穿，光着身子穿着破烂不堪的旧棉袄，领口衣襟上的污垢结成了黑亮的板，身上散发长期不洗澡的臭气。虽然他一付饱受折磨的样子。但思维清晰，目光有神，显示出坦荡不屈的神情。不久之后，父亲借亲属再次探监之际，带出了写在那半张残破纸片上的短信，其中写道，“我的凄惨这不说了，但愿有面谈之日”（《家书》12页）。我久别之后见到正被专案审查的父亲时，为他的处境感到震惊。

父亲在写过那张纸条上的信以后的几个月里，被施以公审，判处16年有期徒刑。这对一个近七十岁饱受折磨的老人来说是多么巨大的打击。父亲刚被定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如此“弥天大罪”，却被立即释放安置。这个突然而来的颇具戏剧性的事，对我来说是有思想准备的。父亲曾写着，“不管他们用什么方法，我都不害怕，因为我对自己有什么问题始终是心中有数。”看来他对自己以后要作些什么，早已有了打算。父亲在身体还很差的情况下，不顾治病养伤，立即开始了写回忆资料。他克服各种困难，认真勤奋工作，坚持笔耕不止，直到2002年他去世之前。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坚韧不屈，敢于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奋斗到底。

高：您什么时候萌生念头编注《邱会作家书》这本书？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程：父亲关在狱中所受摧残的情况，对外是严格封锁的。父亲被安置在西安后，对外保密。他仍然受着监管苛待。然而，在社会上却流传着一些消息，说他们在狱中受了优待，照顾很好，保外就医后，过着“优裕”、“自在”的生活……这种谣言源源不断，引导着社会的视听。父亲去世后，他的回忆作品以不同形式出版了，披露了大量事实真相，包括对他们曾采取的严厉逼供信和惨无人道的人身残害，引起了社会很大反响。于是，谣言又有了新的指向，非议父亲回忆的真实性。说什么父亲的回忆“笔法较为随意，有点类似于纪实文学。没有交待信息来源”，对于我记写的父亲的一些谈话，说是“不可能以那种方式进行那么多交流”，极力贬低打压。

面对这些，我萌生了要写一本书的想法，向世人说出信息来源和相关证据，展示那些历经艰难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于是，我决定以父亲出狱后写给我的几十封信为线索，加上一些重要附件，都是父亲写的原始材料、手稿真迹、原始录音等，汇集成一本书出版。因为它记录着父亲与儿子二十多年的心灵交流，书名定为《邱会作家书》。2014年，适逢我父亲诞辰一百

周年纪念，就把它当作向敬爱的父亲的献礼。现在终于如愿以偿！

高：在您看来，本书披露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程：前几年，一批文革期间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和史料面世了，这无疑对中共党史、国史是一个重要事情。有资深学者称：研究文革史进入了“吴李邱”时代（指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现在出版的《邱会作家书》，是“吴李邱时代”的产物，是他们的延续、扩展和深入。

首先，它提供了一些新的史实，并对已有的史料更加细化、深化。而且这些是以邱会作的亲笔家信、回忆手迹、录音稿亲笔修改件等形式出现的，显示了它所承载那些忆述、谈话的真实性、可信性。如父亲于公审前几个月在狱中写的被偷带出来的短信，透露了公审前操办者的一些内幕，揭示了此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依法，更多是在施以政治手段。父亲出狱后写的回忆稿《深得人心》、《文革政治漩涡中的周恩来》（《家书》98页、206页），忆述了文革中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的一些活动和他们之间鲜为人知的关系，非常珍贵。而父亲的回忆稿《初到北京工作》（《家书》325页），忆述了1956年全国“肃反运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及其后的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彭德怀领导批判刘伯承、粟裕等人的情况。有关这方面当事人的回忆非常稀少，所以它有着相当的价值。

还有，它如实记载了公审后主要当事人的真实状况。它不仅是个人经历，也是国家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过去，对“反右”斗争有记述，对运动后“右派”处理、悲惨遭遇的忆述，进一步揭示了“反右”斗争的本质。而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被打倒后的遭遇，千万普通家庭苦难的记述，组成了文革史的一部分。可是，对父亲他们的情况却少有触及，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敏感问题”。这次《家书》的出版，相当程度上填补了一个历史上不可缺失的空白。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内容引人注目：

其一、公审后把父亲安置到西安，继续让他过着艰苦、屈辱的日子，某些生活条件甚至还不如监狱。以至于父亲在要求改善生活无果的情况下，说吃不消这样的“保外就医”，要求回到秦城监狱去。

我当初以为那样待他，是文革恶习的延续，很快会被纠正，但没有想到一直维持着。父亲过着拮据清贫的生活，直到快去世前，不得不让子女帮着养老（《家书》261页）。

对此父亲很感慨：原本是领袖和党的错误，他们已经代之承担了责任，被关了十年。你们认为整得够了，安置了，就是把老帐结了嘛！剩下的就是我们的历史功劳了，总不能不承认吧？应当让我生活过得去，有点做人的起码尊严吧？！那就不应当再羞辱我，在生活上难为我，让我像个叫花子一样过日子。一个政治家，当权了，要豁达大度一些，不可以这样小肚鸡肠！再说，羞辱了你的政治对手，就是羞辱你自己。

其二，对家属仍然进行株连。父亲出狱后发现，我们亲属子女们都还在株连的困境中挣扎，特别是我母亲，还被加重了处罚。在父亲的家信中，有好多封都是为“营救”我母亲在设法努力。父亲说：我被扣上那么大的“反革命帽子”，才判了十六年有期徒刑，而胡敏却变相地被判了“无期徒刑”。我都被放出来，自由了，可她还没有解脱。这不是故意整人，不是政治报复，又是什么？！

我的祖母，一个当年在中央苏区支援红军作战、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当红军的苏维埃模范，这么一个农村老太太，居然“九一三”之后在医院里被停医停药活活饿死，而我的叔父也被迫害致死（《家书》174页）。这可是两条人命呀！却没有人过问。

有些人口口声声说株连那套东西是文革造成的，是“四人帮”搞的。可是“四人帮”早抓了，文革结束好些年了，这种整人还在进行，而且有些人搞得很起劲，变本加厉。这只能令人思考体制本身和意识形态中深层次的原因了。

父亲说了一句话很是让我记得，“维持一个冤案，比制造一个冤案祸害人更多！”他感慨地说：中国共产党有好多好的传统，也有坏的习惯。文化大革命以来，坏习惯坏风气在膨胀和扩大。就干部政策来说，整了一个领导干部，还要整他老婆，整他的父母，整他的子女，就连我们家八十岁的老人和年幼的小孩，甚至婴儿也不放过。现在搞批判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应当纠正的东西太多了，要恢复的好传统也太多了，但是有些人只是对政治报复感兴趣，对于彻底否定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嘴上叫得很响，实际上并不想认真去作。

其三：继续对父亲他们进行监管，直到他去世前。1987年父亲有期徒刑到期之时，他本以为要解除监管恢复公民权利了，没想到对他却是“维持原状”。父亲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实质，说这么干，就把所谓的“依法行事”的面纱揭下来了。这里哪还有什么真实意义的法律？只有不受制约的权力！

父亲进行了抗争，给中共中央赵紫阳总书记写信求救（《家书》169页）。之后，父亲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政治上并无松动。在他去世时，中纪委发文规定了“六不准”（不准发消息，不准举行任何形式悼念、不准发讣告等），甚至连父亲遗像上都不许对他有正常的称谓。对人如此严酷，去世了还要剥夺他和家属的公民权利，监管管束他的后事办理。如果不是读者从《家书》中的文字和相片看到这些，怕是难以置信。

《家书》在披露阴暗的同时，也记载着光明和善良。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的人很多，有普通老百姓，有老同志老干部。父亲的一些原来的老领导去世了，可他们的子女还在帮助他，向上反映情况，为其奔走。后来，父亲居住的西安干休所工作人员，虽然无法改变大格局，但在他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给予父亲好的照顾。最值得一提的是党的前后两位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在他们主政时，关心爱护父亲。胡耀邦直接批示，让我母亲结束“终生劳改”，返京复查。他还为我们子女解除株连进行了多次指示，加以催办。赵紫阳曾直接关心过我们子女，解决过因受连而产生的生活和工作困难。父亲刑期结束，还要被继续非法监管之时，向赵总书记写了信，抗议对他“维持原状”的苛待。不久之后，父亲的“人事关系”从省公安厅监管部门转到省委老干部管理局，他住进了干休所，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胡耀邦、赵紫阳两位总书记坚持思想解放，平反冤假错案、力推改革开放的丰功伟绩固然会名垂青史。而他们对父亲这些人的处理，努力想改变之前的不当，待人的宽厚坦荡，也是一种历史，应当把这些告诉人们。

高：《邱会作家书》汇集了不少你父亲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有许多不同寻常的见解？你为什么会编注这些内容？

程：研究历史，不仅要依据事实，而且需要对它们研究、分析、考证。其中，当事人对彼时事件、人物的看法、理解和判断，不管是他那时的想法，还是事后的反思，也很重要。一定要记录下来，进行研究。这一点，过去有时被忽视。不是说文革史研究已到了“吴李邱”时代吗？应当对已有的和新披露的史实解读，但其中很重要的是吴、李、邱本人自己的解读。这也是一种宝贵的历史。从目前我的了解，父亲留下这方面的东西最多，他作为当事人在现场，有些在别人看起来并不起眼的事，或是想不到的事，他都能细心观察、思考，剖析出深层次的原因。凭借它们，有时会对一些扑朔迷离的事件和人物动机的研判，有茅塞顿开的感觉。

比如：毛泽东和林彪交恶的原因，通常归咎于林彪有野心。而父亲说，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了思想分歧。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认为，林彪提出“张春桥的问题”，事实上是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不同的看法了，实质上就是冲着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主席发现了林彪也不是一个听话的人了。小人物触动“文化大革命”不要紧，林彪触动“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问题呀！（《家书》274页、308页）。

又如，毛主席自庐山会议后，为何对林彪步步紧逼，致使亲密战友反目为仇。传统解释是“党内路线斗争”，林彪要“谋反夺权”。但父亲不那样看，认为：毛对林的问题，简单来说是毛泽东要不要林彪的问题。“要”是一种处理方法，“不要”了是另外一种处理方法了，因为主要矛盾在毛泽东方面。（《家书》275页）。父亲的话言简意赅，却很深刻，道出了中国执政党体制上的缺陷。历史上党内那么多“路线争斗”中，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是这样。后来邓小平对胡耀邦、赵紫阳也是这样。某一个人高居在党和国家法定的最高领导之上，一个人说算，这本是文化大革命的弊病，可是后来却继承了这个毛病。

又如，对“九一三”所谓的“军事政变”。父亲在本书里的一篇讲话《谈九一三事件》中，坦率地说了八点不可能的理由，依据的是他在现场参加中央政治局处理该事件时的经过和观察。我相信读者看了以后会感到那些分析非常理性、客观，有很强的说服力。（《家书》278—281页）。

“军事政变”，这个结束了父亲政治生命的事件，在公审他之前居然没有正面询问过他，后来公审当庭也没审问他，却以此定了他大罪。他说，从1971年“九一三事件”到1981年公审的10年间，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为什么不公布呢？！如果有这个材料，这是打击林彪的“核武器”呀！那是致命的打击呀！后来，我看了当年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纲领是“设国家主席”和提出“天才论”，这个能够是武装政变的反革命纲领吗？关于“设国家主席”，林彪即使提了100次意见，他还是一种意见呀！“天才论”的见解，即使林彪说了100次，也还是一种见解呀！说这些就是武装政变的纲领，这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呀！（《家书》281页）。

再如，对“九一三事件”牵涉人员的处理，毛泽东为什么在情况还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要定案，打击了一大片。毛泽东这样的智者，为何执意如此？父亲回忆了发生九一三事件后一次政治局会上的场景：毛主席要汪东兴回福建厅的时候要传达一句话，就是“林彪帮了我一个好好的忙”！……当时，我的理解是：毛主席这一句话的含义，就是他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林彪）他“帮了一好好的忙”嘛！他死了嘛！……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林彪头上了。这就是毛主席处理“九一三事件”的主要逻辑，也是主题思想吧！（《家书》317页）。

高：你父亲有如此的思想和见地，是否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程：是有一个变化过程，比如对文化大革命，变化就很明显。

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紧紧地连在一起，他说他决不会去“反毛”，去否定它。父亲在文革中受到摧残，说起来义愤填膺、痛恨不已，但他坚持认为文革是共产党领导的历时十年的政治运动，而非简单的高层权力内斗。它是党和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有它发生和存在的理由。

父亲反对把那段历史采取完全割断的“一笔勾销的办法”去否定。他对历史和现实不停地反思，越是晚年，他的思想越是成熟。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声称“不否定”，变成了批判地总结，为历史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父亲说：毛主席最大的错误是搞了

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毛主席为了坚持文化大革命，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说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的马列主义”。但这是不可能的呀！你把国家都搞乱了，把中国都搞坏了，你中国共产党还能成为马列主义政党？！领袖本人正面作用很大，反面作用也很大。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过程中，他是正确的，你看他起的作用多大呀！文化大革命他是不正确的，你看他的反面作用多大呀。毛主席起正面作用的时间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间在他一生中到底还是短的。（《家书》291、301页）。

父亲在认识上有这么大变化，得益于他惊人毅力的学习和思考，他认真读书，上老年大学，坚持写笔记，学习新知识。从最新的科技成果，到历史考证发现，从国际上发生的大事，到国内社会新的动态，都在父亲的学习笔记中记载着（他留有多本笔记）。在父亲刚到西安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没有钱订报刊，就到附近小旅馆里借各种报纸读。后来他经济也不宽裕，可是还购买寻找了大量的书籍文献资料，如毛泽东等人的文稿、周恩来等人的年谱，党史军史专著和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回忆录更是放在他的案头，不断阅读。一些重大事件，如中央里胡耀邦、赵紫阳等人事变动，以及国家发展建设上一些大事令他反复思考。晚年的父亲想得深了、看得远了，视野和心胸更开阔。他的这些变化，读者可以从阅读《家书》中明显地体会到。

父亲写回忆经历了21年（1981——2002），这和他参加革命武装斗争的21年（1929——1950），和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工作的21年（1950——1971）一样多，是个漫长的过程。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是中国冲破文革思想禁锢，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生活于其中的父亲，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早期回忆，受隔离和困难处境束缚，有时显得压抑封闭，申诉和辩解、受迫害的怨气和对领袖的感情缠绕在一起，要表白自己的冤情和对党的忠诚，以早期的稿最明显，中期写的稿子中仍有痕迹，但还是放开了思想，对史实敢说敢写，对领袖的错误直言不讳，可仍然有被冤屈求清白的情绪和辩解时的激愤。晚年的父亲逐渐淡泊了那些，更注重回忆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从中汲取和总结经验教训。他思想解放，多了总结反思，对史实的回忆更加丰富，评写领袖功过是非更为客观理性。其实，父亲的思想一直在变化着，在二十多年武装斗争中，他从少年红军士兵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在二十多年的国家建设中，他从军队干部逐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队和国家经济工作负责人之一。而他人生经历的最后二十多年，尽管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而且生活艰辛，可是他思想从来没有落伍。

高：您对父亲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最让您为他自豪的事是什么？

程：我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人格魅力。

他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没有背叛自己当初选择的革命道路，尊敬指引他走上这条道路的领袖，一直坚持着“老干部、老革命、老红军”的操守。

在这里，只要举出他对领袖人物的看法，就可以理解我的意思了。他对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人，无论他们被视为“神”，或是还原于人，无论在受人崇拜，还是受人诟病的时候，父亲对他们都能坚持实事求是讲真话，从不随波逐流。

对毛泽东，父亲很年青时就认识了，并在他身边工作了几年，把他当成爱戴的长辈甚至“家长”看待，忠诚不二。然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却把他打成了“反党集团”成员，造成了冤案，而且这后来又被人拿着对他搞了“公审”。父亲说，我的政治生命被扼杀，是从毛主席开始的。但是，“我是把毛主席放在党、国家、人民的利益之上来考虑问题的。诚然，毛主席有负于我，我是有反对毛主席的资格的。我是决不反毛主席的。”（《家书》129页）。当时国内外一些人掀起了一股“反毛”的风，除了从政治上对毛泽东根本否定，还有不少丑化他个人生活的

书籍和“小道消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父亲说，“毛主席当然是有错误的。他的错误有的可避免，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毛有错误就罪大恶极？要是王明不下台又会怎样？对毛主席的错误，只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就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家书》129页）。

对于林彪，父亲和他有二十多年的战斗和工作关系。他没有因为林彪在“九一三”后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而有意地丑化他，否定他。父亲客观公正地说出他的历史功绩，不仅有战争年代，也有和平时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他抵制江青一伙、稳定人民解放军的斗争。父亲在列举了大量事实以后说：林彪反“四人帮”是在毛主席生前反的，这就等于在太岁头上动土，要有最大的胆略和冒着很大的风险才能这样做，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为党的利益而奋斗他才能这样做的。在毛主席身后反“四人帮”，我并不持异议，并不是说他们反的不对。但是，毛主席生前和身后反“四人帮”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说，林彪反“四人帮”是坏人与坏人的斗争，是坏人之间的斗争，他们反“四人帮”就是好人同坏人斗争。这种说法是与历史不符，也与情理不合。（《家书》314页）。

对周恩来，父亲更是感情深厚。在红军时期王明路线盛行的1934年，周恩来曾救父亲性命于肃反的处决枪口之下。此后，他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多年，有着如父如兄的情谊，这在他的忆述中有很多这样的内容，充满和感激和亲情。但是，对这样的大恩人，父亲在回忆中，对周恩来历史上的两次王明路线错误毫不掩饰。现在的主流忆述，压倒的舆论是称颂周恩来的文革作为，淡化开脱其所不当，甚至邓小平都说他是“违心地在做事”。父亲却不那样，还是如实说出其作用和责任：周恩来就是文化革命的“总参谋长，或是总管”。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小事都是毛主席点头的，大小事都是周总理执行的。……周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什么？“拥护、执行”四个字就完全可以表达。（《家书》201、221页）。

对于在文革政治漩涡中一直在政坛上站住脚不倒的周恩来，父亲说出了—个关键原因。“中央政治”是周恩来的专用语。过去他比较含蓄地用这个词，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就公开对政治局的一些同志讲了，对黄、吴、李、邱明确说，我们讲的‘中央政治’，是指毛主席、林副主席、和那个人（江青）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会有大的麻烦……周恩来对江青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和错误心里明白，但他很少说。对江青的霸道行为，周恩来是忍让的，有时甚至迁就和放任。（《家书》228、214页）。

对邓小平，父亲和他没有什么历史过节。邓在文革中受毛泽东恩威并施，两次整下台。毛泽东去世后，邓再次复出，消除毛泽东影响、严惩毛妻江青本是自然之事。可邓把早已结案的“林陈反党”案又翻出来。把他们和“四人帮”用一个“集团案”绑在一起，打成了反革命。这令父亲晚年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在父亲安置到西安后，听到一些干部群众对邓小平那样否定毛泽东不满，对他的上台有很多嘲讽非议时，父亲却说，他是够资格的毛主席的接班人。至于他要把毛主席反的不像个人样子，那是另外的问题了。解放前国民党不能没有蒋介石，现在我们不能（没有）邓的道理作用是一样的。（《家书》128页）

类似这些，在父亲的书信和忆述中还有很多。正是我从这里面看到，父亲不以个人私利说事，不以个人好恶评史，感到了他胸怀坦荡的个人魅力。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忆述才有价值。

高：在书中，你父亲写的信和一些作品，它既是家书，也是国史，它有什么让你非常重视的。

程：父亲如何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如何看那个时期发生在中国的大事，是我非常关注的。因为回顾历史，是为了认识未来。而对当前的正确认知，也是搞清过去历史经纬的要素。

父亲被保外就医后，他不是封闭于过去，而是着眼于当代。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有很多干部和群众还在疑惑，父亲就明确赞成，他早在1983年2月给我的信中就说，我对经济改革是全部能接受的。我认为这种政策既是救民的政策，也是救他们自己的政策。要是不从农村开始改革经济，现在不知乱到什么程度了，他们自己也可能被人赶下台了。（《家书》46页）。父亲这个认识，和在会上主政工作的老干部相比，也是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了。

父亲反思了中国1960年开始的“三年经济困难”，说有上千万人饿死。中国老百姓历经灾难，父亲说，作为一个世代农民的儿子和长期在农村根据地战斗生活的人，他太了解中国农民了，他们实在太苦。而改革从农村开始，是中央走了关键性的一步，走了一步好棋。

父亲在之后的信里，不止一次提到改革开放。他不仅看到了改革的外在现象，而且看到了更深的内涵。他认为，当时中央以农村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有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在过去，“三面红旗”人民公社、大跃进，是毛泽东的“禁区”，他从来不许别人说三道四。谁人要是闯了那些“禁区”，谁人就要被打成“反党分子”。现在他们大胆地在这上开了刀，破除了过去多年的“迷信”，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父亲进一步看出了它的伟大意义。他1987年11月在给赵紫阳总书记的信里附的学习笔记中写道：“毛主席创造性地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改革开放的路线，这是对马列主义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我们依靠马列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依靠这条路线也一定会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家书》155页）。

父亲当时能有这样认识，令我很惊讶。因为四年之后的1991年，邓小平南巡时还在排除阻力推动改革，谈论的还是对改革开放的看法，纠正“姓资还是姓社”的错误认识。而父亲很早就看到了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发展的伟大意义。

父亲晚年虽然远离了政治中心，但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每当有回潮倒退，他忧心忡忡，每当有新的进展，他感到高兴。他没有沉浸于个人荣辱得失之中，而是把国家的命运放在心头。他对此有很多评论，其中有个观点让我很注意，他当初就说，以后一直强调：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起步，从政治改革开始的。这点后来被人们忽视了，误以为是从经济改革开始的。他说，正是中国以政治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起点，才有以后那么大的经济成就。后来，中国搞政治改革，远没有当初开始改革开放时那样的勇气。

高：您想对《邱会作家书》的读者说些其他什么话吗？

程：我把这本新书奉献给读者之前，有些不安，因为它和我之前写的《心灵的对话》《历史的回顾》《往事回眸》一样，是在缺少资料的情况下做的，难免有疏漏之处，少不了差错和误笔，也没做到“为尊者讳”。但是，给了我勇气的仍然是父亲的一句话，“我们的东西会有瑕疵、不足，但比那些时间地点少有失误，而关键内容错了误导人的东西可是好多了，人们需要听到真话。”这个意思，父亲多次提出，说“我们的国家有一个大的政治阴影，有一个幕，是政治掩盖了历史，所以历史就没用了，都是政治。政治把它掩盖了、歪曲了。”父亲一直强调，这一层阴影要把它扫除掉，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大家只要说真话，真正的历史自然就能搞出来了。（《家书》315、318页）。

父亲晚年做的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父亲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晚年走过的路和坚持做的事情并没有结束，他还留下了未发表的数以百万字计的遗稿、日记、书信、短文、

谈话录音稿等，有待整理，让它们面世。我想，越多人把留藏在自己手中的历史资料公开，哪怕它们是一家之言，并不完整，有一定局限性，甚至有缺陷，但只要大家努力去作，中国那段历史的面貌就越能真实地留给后人。

□ 原载《名星》第9期2014年7月

~~~~~

## 【拒绝遗忘】

拒绝接受道歉恰当吗？

• 余不洁 •

宋彬彬在北师大女附中做出的道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人物，她的一言一行自然都在社会的关注中，此举引起轰动效果，也在意料之中。不过，她的道歉既然主要是针对其中学时的校长卞仲耘，虽然邀请了众多的老师和同学，却单单没有邀请卞仲耘的丈夫已经年逾九十的王晶垚先生和他们的子女，此举着实不合情理。宋道歉后，长时间以来一直和宋彬彬一起调查卞仲耘遇害事件的叶维丽，又随后发表了一篇致王晶垚先生的热情洋溢的公开信，在畅叙两代人的友情的同时，告诉王晶垚先生和世人，学校的其他校领导和老师都已经原谅了所有的同学，似乎是王晶垚先生也应该原谅她们。这封信读下来，让人感到五味杂陈，尤其那种“逼宫”的意味，更是让人像是吃了怪味豆的感觉。最终，王晶垚先生似乎是按照她们的预料，发表正式声明、公开拒绝了她们的虚伪道歉，给这次活动画了一个休止符，也给世人留下了更深层的疑虑和担心。

这首先就涉及到了宋彬彬的道歉是否真诚的问题，其关键在于她们是否把当年的事实真相和她们自己的言行坦白地告诉了世人，否则，道歉便无从说起。真诚的道歉首先意味着承担责任，如果道歉仅仅是表示自己内心的懊悔，那毫无意义。道出全部真相，无疑是最基本的责任。

在她的道歉中，她所承担的责任仅仅是保护不力而导致卞仲耘死亡。这个说法很值得怀疑。卞仲耘的死亡并不是一个突然的过程，更不是某人偶然失手将卞仲耘打死。卞仲耘的惨死是一个长时间虐待和殴打的结果，这样的摧残甚至都不是一天两天。对这些在同学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当年的表现，一个最高的估计，她们充其量不过是作为旁观者而已，用没有“保护”好师长这样的说辞显然过于做作。说到这里，忽然想起过去曾经听到过的一件事情：一个任意欺负他人、近乎于恶棍的男生，有一日却被一个同学打得不断地痛嚎而不敢还手，因为那人的父亲比他爹高一个军阶。至于贵族女生的故事如何，在下没有听过。因而，对北师大女附中的事情便格外“好奇”。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环节令人生疑，就是这些学生事后是否对身受重伤的卞仲耘进行过抢救？按照王晶垚先生和其他人的资料，从卞仲耘濒临死亡到送入医院，前后长达四、五个小时。这期间既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联系近在咫尺的医院，用“抢救”一词，实在有点嘲笑天下人的智商。而且，一个遭受了残酷殴打、瞳孔已经没有了反应的人，在酷暑之下弃置四、五个小时，还能否存活？这凭借常识也可以做出判断。根据王晶垚先生的记述，在送医院之前卞仲耘早已经死亡。作为最重要的当事人，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的证词的可信度无疑是最高的，因为此前他并没有和学校的任何人有利害关系。从王晶垚先生当时立刻买来相机、拍下卞仲耘遗体伤痕累累的照片以及对其他物证的精心收集和保护的事实看，王晶垚先生的严谨和执著无疑值得人们信赖和敬佩。

至于宋彬彬等人推车送卞仲耘到医院的情节也和其他证人早期的回忆资料完全冲突。那些

资料证明，是医院的医生和护士用担架将卞仲耘抬进医院。而对这样一个重大细节，最后在医院出现的几个当事人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说辞，这其中包括刘进和宋彬彬等，而是以过于紧张没有清晰记忆（懵了）应对。相反，所谓宋彬彬几个人推车送卞仲耘到医院的情节却都是其他人提供的，这本身或许就足以说明问题。如果在是否存在“抢救”这样一个重大的细节上，有人故意造假和渲染假历史，那只能让人认为，有人还在继续犯罪。

这几年，在卞仲耘被残害致死的事件上，社会上替人转圜的话说得很多，揭露凶手的话说得少，显然，这和目前的政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当年那些打人的人地位优越，今天更加优越，而当年的受害者今天依然处于弱势。在这样的形势下，敢于说出有损于强势集团人物的真话，显然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而为强势人物解说，虽然难以消除帮闲和巴结权贵的嫌疑，除此却并无任何实际危害，或许还有点什么好处。听到最近几年才出现的这些类似“抢救”等等令人诧异的说法，真让人感叹不知今夕是何夕。

还有一点似乎值得提醒一下，北师大女中的这桩残酷殴打师长、致使多人伤亡的惨案，已经成为整个民族当代史上的标志性重大事件和“历史遗产”，所有的当事人，无论是加害的一方，还是被害的一方，在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都已经没有可能简单地了结此事了，任何暗室中的谋划和交易都是徒劳的。甚至可以说，所有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也没有权力阻断世人对此案的关注和探究，而无原则地宽恕凶手也是令人无法认同的。受害者以及其他知情人如果认为时机不合适，完全可以保持沉默，把真实的纪录留给后人。孔夫子所谓“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的教诲，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缺少的正直和德性。在主流社会千方百计掩盖历史真相、甚至伪造历史的时候，个别受害者和亲属轻易地表示所谓的原谅和忘记的高姿态，完全是据小仁而忘大义。王晶垚先生先生身处逆境却坚持不懈地追索真相，这才是值得尊敬的大仁大义。在没有真相之前，所谓的宽恕和遮掩，说的重一点，实际上是包庇罪犯，鼓励再次犯罪。只有让所有的人明白，任何一个罪恶都必须追究个人责任、作恶必须付出代价的时候，才有可能防止文革那样的集体犯罪。

以当时作恶之人众多为由，从而得出不存在凶手的说法更是令人无法接受。任何强调当时的体制和气氛、而淡化个人责任的说法都是狡辩。毫无疑问，当时的统治集团应当承担主要罪责，但是，这并不等于具体的恶行中的凶手就是无罪的。而且，许许多多的资料也清楚地显示，凶狠残暴的加害者并不多，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并非完全是出于愚忠和幼稚，而是，为了一己私利和私愤而犯罪。至于年龄大小、罪刑如何、能否追究法律责任、如何处置凶手那是司法机关的事情，是国家的责任，但是，找出每一个凶手，至少不包庇凶手，是所有知情者的良心所在和义务所在。

□ 原载《万维读者网》  
~~~~~

【史实辨证】

卞仲耘命案争论拾遗

• 华新民 •

由于宋彬彬等人在今年初的道歉，卞仲耘命案以及围绕它的一系列争论又热闹了一阵，几个月过去，在各方把自己要说和能说的话说完以后，现在看来又归于平静了。类似的争论，在笔者记忆中已经发生过两次了。第一次是2003年，卡玛摄制的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在北美上映，是宋彬彬第一次在公众媒体上替自己澄清和辩解，在海外留学生为主的人群中引发了争论。第二次是2007年，宋彬彬在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时被评选为“知名校友”，引

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广泛注意和批评，包括受难者亲属的抗议。这一次的争论已经是第三次，今后是否还会有第四次、第五次呢？即使有，也不会多了一——对卞仲耘命案这一文革历史事件的追究和争论本身，也将伴随着岁月流逝和当事人的老去，成为一段历史：探索历史真相的历史。

趁着它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的今天，笔者作为几十年来一直关注此案争论的局外人，注意到这段“历史的历史”尚有一些因利益相关或环境所限而被人们有意无意地遗漏的方面未被论及，在此作一些拾遗补漏的议论，供此案的涉案者、研究者和关注者思考。

（一）

卞仲耘命案本是1966年“红八月”发生的许多命案之一。由于它是这些命案中发生在北京的第一起学生打死老师的事件，也由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王友琴等研究者和亲历者——主要在海外——对此事件的追述和研究，以及后来胡杰摄制的影片《我虽死去》，它成了今天最受人们关注的文革案例，以致网络上有人把它说成是“轰动京城的惨案”。就连当年的在校学生，也把它称作“在当时轰动全国的事件”。（李红云：“反思文革拒绝遗忘——老三届同人座谈会纪实”，《记忆》第106期，2014-01-15）作为亲身在北京经历过文革的人，笔者要在这里澄清，卞仲耘命案从来没有轰动过京城，更没有轰动全国。对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来说，将此案说成“轰动京城”是不了解历史造成的错觉，有些亲历过文革的年长者来也跟着这么说，多半是错把今天的知识代替了当年的记忆。

轰动不轰动，只要看一个细节就能确定：当年卞校长的一位同事为了表达自己的同情，只敢用左手写一封匿名信偷偷摸摸寄给死者的家属。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中国的社会事件，只要官方没有报道，民间怯于传播，就不可能广为人知，是无法“轰动”的。事实上，1966年的8月份，卞仲耘之死在她任职的师大女附中之外，只有少数人知道，哪里谈得上轰动？笔者当时是与八宝山相邻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记忆中完全没有卞仲耘这个名字，以及她被学生打死这件事。二十多年之后，人在海外，才知道当年在离自己学校不远的一所中学里，发生过这样一桩命案，又过了若干年，才被告知受难者的长女还是当年生活在同一个校园里的校友。当年的国人，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都在潜意识里具备了一种政治判断力，知道什么事可以在什么样的圈子里议论，例如“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是不能随便讲的。文化革命初期，别以为当局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像学生打死老师这种给文化大革命“抹黑”的事是不能随便传播的，说出去被人举报，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所以有些受害者的亲人也常常对外人说，他们的亲人是死于某种疾病。这就使现在有些文革研究者以死者亲属的证词为依据，考证出某某受难者是死于“心脏病”，或者某某自杀者是由于“抑郁症”。

就像人们知道有些真实的事不能随便传播一样，人们也知道有些不实传言可以放心大胆散播而不会受到追究。笔者的文革记忆中，就有这样一件事：与“学生打老师”差不多同时，那副“老子儿子”的对联从中学传到大学里。大学生一般比中学生更理性成熟一些，支持对联的人并不多。就在这时，传来城里有人用菜刀砍杀破四旧的红卫兵的消息，被对联的支持者写成大字报，来证明了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使得许多本来在对联问题上持温和立场的人，在“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面前不得不转变了立场。几十年之后，人们才从王友琴等人关于榄杆市李文波事件的调查中知道这一传言背后的真相。（王友琴：“文革受难者李文波”，《文革博物馆通讯》zk0101d）

所以说，卞仲耘命案在整个文革十年和以后的许多年里，并不是一件令人瞩目的事件。其实，何止卞仲耘，就是老舍投水、傅雷夫妇吞药等事件也一样，除了死者家属外，也只有少数人知晓。文革结束后，田家英、吴晗、邓拓和老舍等名人高官得到平反昭雪，被媒体广泛报道，而卞仲耘命案，可能是因为“级别”太低，也得不到官方媒体的关注，所以从来就没有过“轰

动全国”这样的事，直到2007年师大女附中九十年校庆。这次校庆把一位当年的学生评为“知名校友”，才使卞仲耘这个名字开始在国内兴起不久的电脑网络上广为流传，而这要归功于媒体上出现的那个知名校友的名字——宋彬彬。

（二）

今天的网络对于宋彬彬其人其事已经披露得相当详细。她的暴得大名，是因为她在1966年8月18日的天安门城楼上为伟大领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从现有的资料看，如果撇开“八一八”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发生的事，她在文革中的表现大概不会比其他高干子弟受到更多的关注。关于这一点，笔者曾经做过一点定量的分析——

2003年由卡玛等人执导的英文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上映后不久，在美国的一些媒体上开始出现对该片的介绍和评论。笔者在网络上找到了七家报刊关于这部影片的述评，这些媒体包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电视指南(TV Guide)、国际电影(Film Journal International)、村声(The Village Voice)和沙龙(Salon)。笔者对于影片中出场或提到的人名在这些文章中出现的频率做了一个统计，得到这样的结果：骆小海——出现在所有七篇文章中；刘少奇/王光美——出现在五篇文章中；李锐/李南央——五篇；遇罗克——三篇；宋彬彬和朱学勤——两篇；其他一些在电影中出场的人则无人提及。对于笔者来说，这个结果初一看有点意外，但是再一想，就理解了：这些文章的作者都是对文革了解十分粗浅的洋人，不止一篇文章把文革的时间段说成是1964—1976，大概是因为电影从1964年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说起。还有一篇文章把红卫兵说成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派别。有一篇评论甚至把王光美和刘亭的身份弄颠倒了。所以上述统计结果或许可以粗略地看作是反映了不熟悉文革的人对那些名字的了解和认知程度。

骆小海名列第一，是因为从文革一开始西方对于红卫兵运动就有广泛的报道，人们对于他们的狂热、暴力和个人崇拜大概都会有一些印象，人人都听说过中国文革中红卫兵的大名，但那只是一个集体名词，《八九点钟的太阳》第一次向世人披露了红卫兵运动原来是一个叫做骆小海的人发起的，这显然让所有的文章作者大开眼界，也是他们觉得第一要紧告诉读者的。至于刘少奇/王光美被五篇评述提到，则是因为刘亭在影片中谈到了他们一家的骨肉分离以及子女对生死不明的父母的思念，这样的故事对很多西方人来说闻所未闻，而家庭亲情是最容易打动西方人的。李锐和李南央父女也被五篇文章提及，想来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而宋彬彬却只有两篇文章提及，在西方人的眼里，她的经历没有多少值得注意之处：同毛泽东有过一分钟的接触和对话，为此受到一些谣言的困扰，后来她来到美国留学，如此而已。

而同一影片，在海外留学生中的反响却是截然相反，所有评论没有不提到宋彬彬的，影片中的其他人跟她比起来颇受到“冷落”。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刘少奇一家的故事已经在文革后的平反以及审判林彪和江青“两案”的过程中广为报道，没有多少新鲜的内容。况且，中国人对于这种家破人亡的事见得多了，产生了“同情疲劳”。骆小海这个名字或许不少人初次听说，但是众所周知，他所代表的红卫兵只是在文革初期几个月内红极一时，同整个文革中后来出现的红卫兵组织没有多少关系。而宋彬彬以及宋要武则是全中国在1966年8月18日那天以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如雷贯耳的名字，不少同龄人在文革中的一段经历或许还同这两个名字有着或远或近的关联，不少年长一点的人或许有过听到“要武”而闻风丧胆的经验。因此关于这两个名字的所有者真实或不实的传闻不会在人们的记忆中轻易消失。尤其是，她在影片中第一次告诉观众，要武这个名字是记者越俎代庖强加给她的，本人并不情愿，这是让人颇感意外的事。

洋人对宋彬彬的“忽视”是由于他们没有国人那么多源于自身经验的联想，从某个角度讲，

可以说他们更客观公正一点。就像在美国为某个案件遴选陪审团时要求候选者同该案件的关系越远越好，甚至不许他们接触公共媒体，以免从媒体上获得先入为主的偏见。就事论事来说，宋彬彬在文革中的那点事，确实比不上骆小海、卜大华和彭小蒙这些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甚至也比不上陈小鲁、孔丹和刘进这些京城重点中学的红卫兵领袖，更比不上后来蒯大富等大学造反派的“五大领袖”。然而，她在天安门城楼上给领袖戴上红卫兵袖章以及领袖对她名字的评价在当时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力，却一点也不逊色于所有这些人，如果不是更大的话。

（三）

尤其让人联想的是，北京市第一起教师被学生批斗致死的事件恰好发生在被伟大领袖叮嘱“要武”的那个红卫兵领导下的校园里。这之间的关系，是宋彬彬及其辩护人在《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个电影中以及后来文章中极力加以否认的，她们的理由是：卞仲耘被批斗致死（“八五”）发生在先，宋彬彬上天安门受到领袖叮嘱（“八一八”）发生在后，“八一八”怎么能成为“八五”的原因呢？事件顺序，一目了然。这个理由确实十分给力，说因为宋彬彬在“八一八”领了“要武”的圣旨，导致了她学校里的学生把校长打死，显然是颠倒了事件的时序。那么反过来说怎么样呢？因为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在“八五”打死了校长，所以“八一八”宋彬彬上了天安门领受伟大领袖的奖励，时序倒是对了，可是同样没有任何历史根据。

“八五”和“八一八”确实没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但是不排除有其他关系。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一段历史，不是把“八一八”看成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目标一致、互相呼应的事件链条中的一环，那么“八五”和“八一八”的关系就会更清晰显示出来。这个历史事件链条，由下列时间跨度为一个月的事件组成：1966年的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北京，批评北京的运动在工作组领导下搞得冷冷清清，提出让学生“自己解放自己”；7月25、26日，陈伯达、江青和康生等人在北京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指责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两天后，7月28日北京市委宣布撤销学校里的工作组；第二天，7月29日晚召集“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毛泽东在刘少奇发言后突然从后台走到前台；过了三天，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信，同一天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四天后，8月5日毛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命令收回刘少奇“关于反对北大6·18乱斗的批示”；七天后，8月12日全会结束，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六天后，8月18日毛泽东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发生了上述的“八一八”事件。这一链条中每个事件层层推进，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即废黜刘少奇，从他手里夺回文革的领导权。其中有些事件当时没有向公众宣布，不可能成为社会事件的诱因，但是中央文革在北大的师生大会上的讲话很快就在各学校传开，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是立刻传达到公众的，毛泽东在7月29日晚的大会上言不发地露面也立刻由会议参加者带到社会上。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也在两天之内透露到社会上。这些信息已经足够向学校中的青少年，尤其是干部子弟传达了一个信号：伟大领袖把尚方宝剑交给了你们，可以为所欲为了。从7月18到8月18，“八五”事件发生在8月5日，事件链展开刚过了时间的中点。或者说，这个事件链威力强大，还没有充分展开就“初见成效”了。

也就是说，“八一八”虽然不是“八五”的原因，但是它作为其中一环的事件链却是“八五”的原因。随着这个事件链的推进，打死人的事是迟早会发生的，只是发生的时间有一定的偶然性。事实上，事件链最早的后果发生在在千里之外的南京，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在8月3日，即上述事件链的时间中点，就把江苏省教育厅的厅长吴天石和夫人拖到大街上游斗致死。南京师院的学生当时可能还没有听到过红卫兵这三个字，他们当中恐怕也没有什么北京意义上的干部子弟。（华新民：“历史从虚无走向实有”，《文革博物馆通讯》zk1302b）宋彬彬及其辩护者是对的：“八五”的肇事者并不是有组织的红卫兵。但是这并不是卞仲耘致死的关键，关键是，那些施暴者在两三天后都成了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的成员，她们在众目睽睽下的暴行似

乎没有让学校红卫兵的领导人接纳她们时稍有犹豫，也没有让那些红卫兵战友有丝毫耻与为伍的心理障碍。同样的，在高层领导的心目中，吴天石夫妇和卞仲耘“死了就死了”，也丝毫不能阻止他们把事件链推进下去的决心。于是在京城，以一个校长的死亡事件为开头，在一个月里发展为让1700多人丧生的杀戮，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八一八”之后，“八一八”的圣旨“要武”无疑是这些人的催命符之一。“八一八”之前和之后的受难者从死因根源上来说，并无不同：这就是1966年夏天的红卫兵运动。只是前者死去时红卫兵运动的岩浆尚在地下涌动，而后者则是岩浆已经喷发而出祸害人间的牺牲品。

所以，由师大女附中的“八五事件”，追索它的根源——7月18日毛泽东回京后发生的事件链条，涉及其中的各个环节，包括发生在“八五”之后的“八一八”，并无不妥，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四）

这些环节免不了也涉及一些小的枝节，包括“开国上将”宋任穷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样的事。这又是宋彬彬及其辩护者极力回避的话题，好像提及此事，就跟当年凡事都要问出身的“血统论”一样。事实上，对于在北京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高干通过子女影响文革的进程，或者指导子女在文革中的行为，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刘少奇、邓小平在文革初期，常常通过自己的子女了解他们所在学校的动态，并且做出一些评论，这些评论就会通过他们的子女传到学校工作组领导的耳朵里，成为这些领导的重要指南。文革初期许多北京大中学校里被选举出来的文革委员会一类领导机构，不管是在工作组撤走前还是撤走后，高干子弟常占据大多数，其原因除了他们的高调强势表现之外，也确实是“民意”所归：大家觉得他们对中央领导的动向了解得比较及时和准确，跟着他们不会犯错误。很多平民（包括中下层干部）的子女在文革初期注意高干子女的言行并根据他们的行事方式来决定自己的行止，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文革后这方面的史实也有很多披露，如宋柏林的日记《红卫兵兴衰录》中就记载了干部子女的家庭内部消息先于中央正式传达渠道的一个例证：宋柏林8月2日的日记记录“从矿院附中那得到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最热烈地支持我们的造反。”这一消息比王任重代表中央向清华附中红卫兵宣读这封信早了一天。矿院附中的这个抄件，来源于该校学生杨冀平的父亲、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陈小鲁对此也并不回避，坦言他跟父亲在文革中的交流和互动，以及周恩来对他的保护措施。比如1966年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后，陈毅就给儿子通消息：“你前一段，毛主席给你做了结论了。毛主席在会上说：陈小鲁好，反对打人。前一段有结论了，你以后要注意，不要到处惹是生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陈小鲁口述”，米鹤都主编《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二册）

而宋彬彬对此讳莫如深，难道宋任穷能够特立独行，对子女没有一点关照？笔者提出这个问题，倒不是追究宋彬彬在八五事件中的行为，背后有其父亲的提示，从而把卞仲耘命案同高层官员联系起来。而是对她在“八一八”后的行为有一些疑惑：她在“八一八”的第二天就宣布退出文革筹委会；对于御赐的名号“要武”觉得这是毛主席的一句“玩笑话”，（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第47期，2010-04-28）采取一种不冷不热态度；对于来自全国给宋要武的信件，连看都不看一眼。这些行为，显然有违当年那种“毛主席的话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氛围；也不合当时红卫兵战士对领袖狂热崇拜的普遍心理。她们的老师刘秀莹在2008年5月对刘进说：“……都以见到毛主席为光荣，给毛主席戴袖章何其光荣，毛是红卫兵中的一员了，你们连做梦都会乐醒的。”（朱晓茵、刘进等：“刘秀莹老师谈女附中文革”，《记忆》第108期，2014-02-15）实际上是提醒刘进和宋彬彬等人：你们当初可不是现在回忆中所说的那种心情。宋彬彬如果真的有那种对领袖恩宠淡漠到

近乎“大不敬”的行为，不免令人猜测背后有长辈高人的提示。

经历过文革的人大多记得，8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套红标题刊出消息：“昨晚7时15分，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宋彬彬竟然在这条“最高指示”发表的八天之后，在刚刚承受伟大领袖恩宠的第二天就急流勇退，宣布退出文革筹委会！而且不久就远离文革运动，成了逍遥派。从带头响应领袖号召到违背领袖教导，难道宋彬彬内心在几天之内真的发生了如此突兀的转折吗？原因在哪里呢？人们自然会把目光转向她的长辈。乃父就在一星期前在中共领导的核心圈内更上层楼，亲历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中央全会上惊心动魄的交锋，或许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站队，或许得到更高领导的某种“交底”，从而对子女有所告诫，是很合乎常理的事情，没有必要讳言。否则，难免给人以虚假的印象。

诚然，宋彬彬对自己的上述行为也给出了解释。她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中说：8月18日从天安门回到学校，原来反工作组的一位同学“对我给主席献袖章很气愤，她认为我们犯了保工作组的错误，没有资格给毛主席献袖章。还说这样做是不分是非，不利于运动向正确方向发展，应该纠正。我们觉得她说的对。”

一个人的心理，又是是几十年前的心理，旁人很难判断其真伪，不过，从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来看，这段回忆中的情节和其中人物的口气，很难拼接到1966年8月18日所有红卫兵盛大节日的氛围中。这里所说的历史事实是，“八一八”以后，和宋彬彬处于相似地位的大、中学里的学生领袖，找不出哪个人和宋彬彬有相似的心理和行为。相反，他们受到“八一八”的鼓舞，比原先更积极地投入文化革命运动中去。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例如，八中的领袖陈小鲁，工作组时期甚至被吸收成为工作组成员，犯的错误不会比宋彬彬小吧？然而工作组撤走并没有影响他在学校里的领导地位，还在8月25日组织起了“西纠”。他们不仅不觉得自己跟着工作组犯了错误，不再能领导同学进行文化革命，反而觉得自己有资格去纠察北京市其他中学里的红卫兵。

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在1966年八月份，就会看到，当时工作组撤出还不到一个月，毛泽东的那张讨伐刘少奇的大字报内容还没有公开，撤销工作组的最初的理由只是为了“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虽然以中央文革为主的领导人在北大等学校的演讲中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当时中央文革刚刚公开亮相，他们的意志只是在他们直接控制的北京大学得到贯彻，在其他学校并不像后来那样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有一言九鼎的分量。受到工作组迫害的少数派，正在为平反而抗争，为销毁黑材料而上访、静坐，自己还没有翻过身来，哪有功夫去追究那些工作组时期受到重用的同学犯了什么错误？

即使是在清华大学这样工作组同反对派学生严重对立的学校，在八月份，多数学生对所谓工作组的错误并不以为然。蒯大富等受到工作组迫害的学生虽然已经平反，但是大多数同学并不认为他们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和路线。例如，清华大学当年的学生领袖孙怒涛在《良知的拷问》一书中这样回忆1966年八月清华大学里的形势：

“一批人认为工作组已经检查了，可以过关，下面应该立即斗黑帮。另一批人认为不先把工作组的错误批深批透，消除同学之间的严重隔阂，怎么能万众一心斗黑帮呢？而‘临时筹委会’提出的建议是，‘根据大多数人意见尽快打黑帮’。坚持要批工作组错误的这部分师生串联起来，于8月8日成立了一个‘八八串联会’……。要立即斗黑帮的那部分师生，不甘示弱，第二天也组织了一个‘尽快打黑帮串联会’，后来简称‘八九串联会’。8月19日，在‘自控系红卫兵’的基础上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头面人物是贺鹏飞、刘涛、刘菊芬等高干子女。它的外围组织就是‘八九串联会’，所以这个红卫兵的别名叫‘八九红卫兵’。‘八九’派的观

点，表面上听起来似乎也很有道理：工作组的方向性错误是斗学生而不是斗黑帮，改正工作组错误最实际的行动就是立即转为斗黑帮。”

孙怒涛这里提到的那些高干子女，都是工作组重用的依靠对象，同宋彬彬在学校里的地位相同，从他们当时的行为看不出有什么犯了错误的思想包袱。贺鹏飞还在8月24日，把北京市的中学红卫兵招到清华，实行撕大字报、砸校门以及殴打学校领导和教授的暴力行动，其势汹汹，不要说认错，就连一点收敛的迹象都没有。孙怒涛还回忆自己曾自以为“根正苗红”，想报名参加高干子女成立的红卫兵，却因为反工作组的历史而吃了闭门羹。可见在1966年八月份，原来反工作组的人并没有扬眉吐气，原来保工作组的人，也没有垂头丧气，双方充其量是处于相持状态。

事实上，工作组的问题被上纲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度，要等到那一年10月份，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中正式才提出来。同一个月里还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陈伯达在会上作了《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的发言，明确提出文革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并指出刘、邓通过工作组推行的路线就是毛泽东在8月5日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路线。

在此之前的八、九两个月中，发生了“红八月”以“破四旧”为名义的抄家打人风潮、红卫兵大串联把运动推向全国、外地学生进京接受毛泽东检阅等事件，这些都是发动群众时期必要的过程，并不是运动目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在十月份发社论，开会议，就是要把已经发动起来的学生引向到他们的目标——摧毁刘邓司令部。而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就是清算他们在六、七两个月的“五十多天”时间里，“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罪行。正是这种引导，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两派之间的相持阶段才告结束，使得原来受到工作组镇压的持不同意见者成为主流语言中的革命造反派。也只有在此以后，被工作组迫害的反对派学生才有底气在保工作组的同学面前谈论谁是谁非，也只有在此以后，工作组时期得到重用的学生领袖才可能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而宋彬彬却在8月18日当天——正是最有恃无恐的时候——经不起反工作组派的一番言辞就落荒而逃。如此超前的行动，更像是一段错位的时间“故事”而不是真实的历史。

1966年8、9两个月的形势，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探究：北京市第25中学生李冬民是该校反工作组派的领头人，后来成为北京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的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不过那是八个月以后的事。据他在《几度风雨几度秋》中回忆，工作组领导运动期间，曾召开全校大会对他们进行24小时日夜不间断的批判斗争，扣上了吓人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工作组撤走以后，反工作组派的待遇稍有改善，不再受到看管关押，但是当有人提出工作组整学生错了，马上受掌权的红卫兵压制。他们无法在学校立足，只能到校外去串连相同观点的学生。他们在北京城区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战友，在9月16日成立了北京市中学反工作组派的联合组织“首都兵团”。如果宋彬彬上面所说的退出文革的原因和过程是真实的话，那么8月19日后，师大女附中那些理直气壮的反工作组的学生应该成为本校运动的领导，并且开始对工作组错误的清算，控诉工作组对她们的迫害。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师大女附中可算是北京第一所这样做的学校，领先于其他所有学校至少一个月。这样一支特别有战斗力的队伍，即使不被中央文革树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样板，至少也应该是“首都兵团”第一批骨干成员。然而笔者没有看到有关的回忆和证据。

人们看到的是相反的回忆：同李冬民的第25中或其他中学比较起来，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对反对派堪称温和。根据刘进回忆，6月17日有13个同学贴大字报指责工作组，工作组组长在对学生的广播中对此作了解释，同时他检讨了自己有“怕乱”思想，“还不够放手”，表示欢迎继续提意见。后来6月27日，又有18人贴出了第二张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师大女附

中的工作组为此部署了“7月7日、8日、9日三个半天开辩论会”，辩论的一个对象不到学校，工作组似乎无可奈何，只能“缺席辩论”。（冯敬兰等：“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第47期，2010-04-28）可见，工作组并没有像毛泽东后来指责的那样“围剿革命派”“何其毒也”，工作组下面的学生领袖更谈不上有什么责任。试问，刘进、宋彬彬等没有参与过对反工作组学生的镇压，犯错误的心理负担从何而来？至于说跟着工作组犯了“求稳怕乱”的错误，那么为了改正错误应该是更激进和不怕乱，这正是其他学校的学生领袖的行为，像刘进和宋彬彬这样完全退出运动是绝无仅有的。

所以说，宋彬彬在八一八之后的行为，只有两种解释：或者记忆发生错位，或者有“高人”在背后点拨。也许还有本文尚未看到的解释，需要对师大女附中在八一八前后的历史作进一步的调查，才能够澄清这个问题。陈小鲁在这一点上是颇有见地的，他建议：“研究要突破‘八五事件’”，“对女附中文革进行整体研究，从1966年初到1969年老三届离开学校”，（陈小鲁：“我的想法和建议”，《记忆》第106期，2014-01-15）他或许也是对八一八后发生的事不无疑问——全北京的红卫兵都还在傻乎乎地冲冲杀杀，你们俩却悄悄开了小差，真的有这回事？干部子弟明白过来退出运动，最早也在十月以后，你们哪来的先见之明呢？

（五）

宋彬彬的道歉没有像陈小鲁等其他人的道歉那样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正面反应，原因之一或许就在于，她的道歉和其它一些言论表面上看也很恳切，很痛心，但给人的感觉是，其中少了点历经沧桑以后应有的达观和坦诚，多了点过于自我保护导致的破绽和牵强，上面所举的她在八一八后的行为和解释只是一个例子。王晶垚老人的激烈负面反应，恐怕也和这种印象有关。起初王老并没有将宋彬彬和其他学生告到法庭上去，没有追究她们的直接法律责任，“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03-13）那么他的气愤从何而来呢？在笔者看来，是宋彬彬和她的团队近几年的所谓调查，并没有为卞仲耘之死提供更多的真相，其实只是为了替宋彬彬等人撇清同卞仲耘命案的干系。王老在开始的时候，对于她们的调查是欢迎的，提供了他手里掌握的全部原始材料，本来期待她们把这个案子的前因后果查个水落石出，让真正的打人凶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然而他等来的却是：调查组在他提供的材料中找到几处瑕疵，虽然目的是为了替宋辩护，给外界的印象却是他老人家的证据不足为信，甚至有伪造证据之嫌。他还等来了宋彬彬被评为“知名校友”，她和毛泽东的“八一八”合影成为校史中荣耀的象征，而最早调查卞案的校友王友琴则被排除在表彰名单之外。至于卞校长死在谁的拳脚棍棒下，王老等到的回答是被学生“你一下，我一下”打死的。在惨案发生的当晚刘进和宋彬彬向吴德汇报时大概也是这样说的吧？还用得着调查吗？

我们不知道，宋彬彬团队的人当初找到王晶垚要求分享老人手上资料的时候，说了些什么样的话，但是大致可以肯定，她们并没有申明是为了替刘、宋撇清卞校长命案的干系，多半是说帮助老人家查清“八五”事件的真相。所以当老人等待了多年而得到上面所说的结果的时候，相信他的反应不止是失望，而是强烈的受骗上当的感觉，所以才会说出那些很重的话来：刘进是“罪魁祸首”，袁爱俊“坏透了”，叶维丽是“坏的典型”。“说这些人悔改，还为时过早。她们这辈子会不会悔改，还要观察。”（冯翔：“王晶垚：‘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03-13）以帮助他整理资料的名义从他手里拿走资料的于羚，则简直就是潜伏的奸细了。被指为“坏人”的宋团队的人，或许有冤枉的感觉：她们不是也谴责了“八五”事件的凶手吗？刘进和宋彬彬不是也承担了一定的责任吗？不是再三表示了愧疚和歉意吗？为此，叶维丽给老人家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公开信，从她自己上一代同王老夫妇的友情说起，把上面的意思重新表达了一遍。不过在笔者看来，这并不能消除王老的“误解”，因为这些话都没有说到点子上。王老当初给她们提供手上的资料，她们没有把它用到正途上，而是用来撇清刘进、宋

彬彬的责任，为宋彬彬戴上“知名校友”的桂冠开路。

当然，宋团队的人可能还是觉得被冤枉了。事实上，她们的调查可能并不限于替宋彬彬辩解，她们确实是围绕卞校长命案做了大量访谈，而且实际上摸清了真正的打人凶手。但是卞校长的家属和公众等待她们公布调查结果的时候，听到的却是这样一类顾左右而言它的故事：文革中某女学生对班主任毒打之后，把一壶开水浇到了老师的下身。严重烫伤、感染、溃烂，在66年夏天给老师带来了巨大痛苦，并造成严重残疾。文革结束后，朋友所在的部门接到一封检举信，告发的正是那个女生。朋友把信锁在抽屉里，内心挣扎了许久，终于决定不转给她的单位。朋友说，如果我把信转过去，她的一生可能因此就毁掉，这将造成我终生的不安。（冯敬兰：“关于卞仲耘案的凶手”，《文革博物馆通讯》zk1005d）

这里我们看到了宋团队的双重标准：为宋彬彬辩解的时候，她们对于有关的叙事和回忆一律当作“故事”，而且声称“故事不是历史”，因而要对它们一丝不苟严加审视。如王老记载的同宋彬彬的谈话，因为宋彬彬“想不起来”，就作为“孤证”而存疑。王老在事发后一年内写的谈话记录只因为宋彬彬四十多年后的一句话就被存疑，是否太苛刻了一点？莫非王老伪造了证据？这大概是让王老愤怒的原因之一。又如，宋团队对于八五时，是否已经成立红卫兵？哪一派红卫兵？那张要求医院抢救卞仲耘的名单应该从左往右看，还是从右往左看？等等，都考证唯恐不细，这种对历史的严肃负责态度，值得称道。可是对于另一些史实的调查，例如当年《光明日报》那篇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是如何出笼的，则一语带过：“是实习记者写的，不知道是谁。查不下去了。”（冯翔：“宋彬彬：‘人生怎么能假设呢？’”，《南方周末》2014-03-13）跟今天有些地方发生官民冲突事件后，政府将所有责任推给“临时工”有异曲同工之妙。

尤其是，对于八五当天学校的几位领导都不得不到学校去接受批斗的细节，人们也没有见到有什么像样的调查。须知，他们在前一天已经遭到毒打，“八月五号，卞胡两位校长回到已经弥漫着暴力气息的女附中校园时，是做了赴死的准备的。（胡校长的一位孩子亲口对我讲，母亲和‘卞阿姨’8月5号都穿上接待外宾时才穿的服装，是准备赴死的。）”（叶维丽：“活在今年的历史：48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记忆》第112期，2014-04-30）这种预感是哪里来的？既然看到了凶兆，为什么还要去送死呢？显然卞仲耘和她的同僚们没有感受到宋团队喜欢强调的那种“权力真空”。相反，他们连躲一躲风头的念头都不敢有，他们感受到的是有一股力量把他们推向校园去引颈就戮。这股力量来自哪里呢？设想，假如没有高一三班那几个学生振臂一呼“斗黑帮去”，“八五”这一天会风平浪静地渡过吗？那些校领导赴死的准备难道是无端的杞人忧天？那么，是谁安排了“八五”这个躲不过的鬼门关呢？有过文革经历的人多半会想起一种合理的解释：红八月里“通令”、“勒令”满天飞。师大女附中那几天有没有这样致命的“勒令”？它又是来自哪个权力呢？不要告诉我还是那几个高一三班的干部子弟！刘秀莹老师也表达了类似的疑问：“是否可以不用表白自己不是负责人，因为一直到八一八，你明显的还在负责，和你打人不要混同在一起，负责人不一定是打人的人，但负责人负的是什么责？应有认识。”（朱晓茵、刘进等：“刘秀莹老师谈女附中文革”，《记忆》第108期，2014-02-15）这是一个和谁打死了卞校长同样重要的问题，却没有受到更多的关注和调查，是意味深长的。

或许是意识到了人们对她们双重标准可能的诘问，宋彬彬团队的人在近来又申明，她们只是一个自发的民间团体，作为宋彬彬的校友，帮助她澄清历史的真相。如果这样定位，那么她们这样做，无可厚非，而且对于某些细节的求真态度确实有良史风范，也颇为成功，有些听信和误传了不实之词的学者，包括外国学者为此都作了道歉。但是人们还是要问：当初你们开始调查工作的时候，恐怕不是这样自我定位，也不会这样申明吧？你们的调查结果最后交给了“组织”存档，显示出调查的准官方背景。否则，王晶垚老人怎么会把自己收集的材料提供给你们呢？那上百个师生，如果不是出于对校长之死良心上的歉疚和对“组织”的信任，怎么会同意

接受你们的调查，如实回答你们的问题呢？退一步讲，既然现在定位是民间调查，那就不必对任何“组织”负责，你们拥有百分之百的“知识产权”，可以凭良知直面这个问题：谁打死了卞校长？人们希望听到你们周密调查和严谨考证得到的非“故事”的历史，而不是讲你们最不屑的“故事”。这些故事透露的意思无非是：打人凶手当年都是未成年人，现在追究他们的责任可能毁掉她们的一生，最好是由她们自己站出来承担责任，云云。人们不禁会问，你们不是自诩为是做严肃“历史”的人吗？那么，请拿起太史简和董狐笔，将下面这句话载入史册——“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本校某学生、某学生……殴打致死”，句号。这样做不需要资格和权力，要的只是良心和勇气。至于凶手是否成年，后来行为是否良好，是否自己投案，那是法庭量刑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不是史家操心的事。对于那种虚化和替代历史的故事，人们或许可以回敬一句：“历史不是官司”。前者是历史学者的职责范围，后者是法律工作者的职责范围。

（六）

事实上，真的有这样一位名叫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的美国法律工作者不远万里，来到北京要打一场官司，在他看来卞仲耘“这件凶杀案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持续几个小时之久，为证人指认凶手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此外，目击者认识凶手（们），应该有几个目击者。”那么多目击证人，这官司太容易审理了。然而，他在北京撞到了“沉默的中国长城”：没有人——包括王晶珪——告诉他参与殴打卞仲耘的学生名字。官司需要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没有了历史，他的官司也就没法打下去了。他认为这是由于“美中两国制度之间的哲学差异”：“中国政府裁定该凶杀案发生在群众运动条件下，因此没有应对其负责的个体，而只应由社会负责。”“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总体判决也大同小异：那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浩劫。耐人寻味的是，这份判决书写于1981年，毛死后5年。因此，甚至毛也不可能承担责任。”而他根据美国的职业训练则认为，“在法治社会里，参加暴力群众运动叫做‘骚乱’，它不能成为个人暴力行为的辩护理由。国家的高压政治也不能洗刷个人犯下的暴力罪行。纳粹分子在纽伦堡审判时所作的‘仅仅是执行命令’辩护被（法庭）驳回。”（Benjamin Harris：“中国长城般的沉默”，《文革博物馆通讯》，zk0903b）

哈里斯先生的看法未免天真简单，这位美国的职业检察官，“一生事业就是起诉凶杀案件”，却看不到在中国的历史和官司之上，笼罩着统帅一切的政治。由于政治的原因，卞仲耘案中的那些嫌犯和证人之间存在着法律上的不平等：中国当局在回复王晶珪的诉讼时，已经申明不再追究此案的凶嫌，因为“追诉时效”已过，因此那些嫌犯是有恃无恐的。而那些说出嫌犯名字的证人，却要冒着被对方控告“诽谤”和“损害名誉”等现行罪名的危险。法律的天平如此向一方倾斜，当然不可能从另一方获得证词。当局这种法律的偏向显然是出于政治原因，因为当今的中国，还存在着另外一些哈里斯可能没有看到的事实，那就是“三种人”在文革后受到了严厉清算。所谓三种人，是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中，前两种很难从法律上加以定义。中国的司法部门在审理“三种人”的案件时，并不遵循哈里斯先生所说的“中国哲学”——让社会替这些人的罪行负责，而是深入追究他们的个人责任，其中造反派的领袖，如蒯大富、韩爱晶等均被送上法庭处以重刑。

哈里斯先生来北京调查的时候（2006—2008年），这种双重标准和司法不公在国人眼里已是人所共知的“潜规则”，而外国人可能还只是雾里看花。它对卞仲耘命案调查的直接影响可以从几则回忆中看出来：

第一则是刘秀莹老师的回忆：“在揭批查时，为卞校长的案子抓了两个人，一个是袁淑娥，一个刘南南。刘南南是革军出身，初中在女附中，高中是女三中的，那时她又跑到女附中来了。当时对她的处理是双开，开除党籍军籍。后来‘宜粗不宜细’又恢复了。”（朱晓茵、刘进等：

“刘秀莹老师谈女附中文革”，《记忆》第108期，2014—02—15）——所谓“揭批查”是在“四人帮”被抓捕后开展的清查其余党的一场运动，1983年后又延伸为清查“三种人”的运动，回忆里所说的两个人，显然是作为第三种“打砸抢分子”被抓的。我们从中顺便也知道了一个叫做刘南南的学生，可能是那些“你一下，我一下”的打手中被人揭发的一位。

第二则回忆是学校的另一位领导胡志涛的儿子说：“1980年代初期，追查文革“三种人”时，公安局曾经找到胡志涛调查。胡志涛问：你们能保证追究到我说的每一个人吗？如果不能保证，我就不说。”（冯翔：“王晶珪：‘我，没有忘记历史’”，《南方周末》2014—03—13）——也就是说，胡志涛已经对司法的公正失去了信心，担心追查会回避某些身居高位的官员的子女而只是找一些平民子女充数顶罪，或许，刘南南首先遭到处理，是因为其父亲的职位还不够高？

第三则回忆也是来自刘秀莹，叶维丽在《活在今天的历史——48年后看女附中“八五事件”》一文中说：“1980年代，参与北京市委组织部调查文革期间中小学命案的刘秀莹（原女附中副教导主任）接到‘上面’通知，要她将所有案卷封存上交。文革后受害人家属上告不果、已开展的命案调查半途而废——这样的情况绝不是个别和孤立的，而是有关文革‘历史政策’的具体体现。”——可见在清查“三种人”的初期，有关部门至少已经掌握了卞案中部分嫌犯的名单，并已经开始了对她们的处理，但是后来却半途而废，所有的命案调查都被中止，而且原来被处理的“打砸抢分子”也得到了解脱。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呢？这种“历史政策”是如何形成的呢？近年披露的历史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实证——从时间顺序上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它是从一封信件开始的。1984年2月23日，当时分别在国家经委和冶金部任职的孔丹和董志雄致信陈云，申诉“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把‘老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发生的问题当作‘三种人’问题来清查；……被视为‘文革’中有严重问题，而影响对他们的使用和提拔。”他们在信中认为“‘老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其大多数人在‘文革’各个重要阶段，表现是好的，是经住了考验的。”他们也承认“老红卫兵”有缺点错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一些未成年的中学生）在‘破四旧’运动中有过过火行为，有的动手打了老师，有的抄了‘地富反坏右’的家，极个别的甚至打死了人。”但是，他们认为“这些错误与那些造各级党委反、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的造反派组织的错误，具有本质的区别，与‘三种人’更是水火不容的两码事。”这封信受到了陈云的肯定，他在批示中指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二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陈云将自己的意见和孔、董的信转送胡耀邦、邓小平及其他中共核心领导，得到一致同意，并以中央政治局会议文件〔1984〕2号的名义成为中共的正式政策指导。（“孔丹、董志雄同志给陈云同志的信”，《文革博物馆通讯》，zk1403d）

我们大体可以确定，刘秀莹接到的将案卷封存上交的通知，就是根据上述文件的精神发出的。从此，所有“老红卫兵”都被从“三种人”中摘了出去。历史在这里被政治结结实实地玩弄了一番——“历史”使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考证功夫，查明了“八五”那天师大女附中还没有成立红卫兵，所以卞仲耘不是被红卫兵打死的。“政治”却说参与迫害老师校长的学生应予赦免，因为她们是红卫兵！面对如此结果，历史学者们到底应当感到宽慰呢？还是失落呢？

“三种人”里唯一能够用法律的手段加以惩处的是“打砸抢分子”，“八五”事件里的那些残害老师校长的学生，是明明白白的“打砸抢分子”，本来是可以查个水落石出的，可是陈云在1984年的一纸批示却说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于是，北京中小学里的命案的调查被中止，调查的案卷被封存上交，行将澄清的历史重新陷于混沌，致使卞仲耘命案到今天还是一桩没有人负责的悬案，这一潭水究竟是被谁搅浑的？

2014年8月6日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